

# 大众化再考察: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与内在逻辑

马宇航

〔摘要〕 2009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女生总量开始超过男生,经过近10年发展,高校女生数量优势逐渐扩大并引起广泛关注,这种被称作“高等教育女性化”的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在世界范围普遍出现。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在世界范围普遍出现的起点和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探讨这一现象所蕴含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呈现了女性优势开始即男性优势结束时高等教育机会的临界范围,进而提出大众化阶段适龄男性人口“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公平的理论边界、丰富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公平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 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女性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比较;相对出让

## 一、引言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女生总量超过男生且发展趋势明显,到2017年,这一新的性别数量差已达147万,这种现象和趋势被称作“高等教育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sup>①</sup>截至目前,普通高校女生总量已在除博士阶段外的各学历层次全面超越男生,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适龄人口女性比例和普通高中女生比例均处劣势的基数限制,并与全国范围的男性人口数量优势形成鲜明倒挂。这一全新的变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以男生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女生为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女性化开始在欧美国家出现,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共性现象,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例如,全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女性人数分别于1982、1984、2005年超过男性;<sup>②</sup>1970—2008年间全球高校男生总量增长4倍多,从1770万增长到7780万;女生总量增长7倍多,从1080万增长到8090万。<sup>③</sup>将最近10年发生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纳入世界范围进行比较与考察,基本明确了其发生与发展的合理性。

---

马宇航,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210097)。

①马宇航、杨东平:《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国际比较研究》,《江苏高教》2016年第5期。

②C. Corbett, C. Hill & A. Rose, *Where The Girls Are: The Facts About Gender Equity In Education*, AAUW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8, pp.55—57.

③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胡光宇、赵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从多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与阐释,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中观层面学校选拔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标准、以及微观层面的家庭因素与两性异同,最终都指向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较为关注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机制,认为社会进步与学校教育的积极变化,在世界范围提升了女孩的高等教育机会。学者们则更加倾向于关注微观层面的两性异同,代表性观点认为女孩更加努力的现状反映了现代社会青年男女关于教育的自我认同存在差异。<sup>①②③</sup>此外,微观层面涉及“男孩危机”的观点在国内外均引起巨大争议。国内学界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以高考成绩为代表的女生学业优势及其原因上,很多研究认为高考科目设置和应试教育传统是导致女生优势的根源。然而,最新研究结论认为高考的性别分辨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是导致高校女生数量超过男生的主要原因。<sup>④</sup>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最直接的原因是女生学业成就在总体上较男生略胜一筹,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围绕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而展开,更加强调教育学之外的学科视角的引入及相关测量方法的运用,导致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载体即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常被忽略。

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选拔制度主要存在三种类型,包括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中学“毕业考试型”、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了能力测试与申请审核的“交涉型”、以东亚为代表的大学“入学考试型”。<sup>⑤</sup>鉴于不同类型的选拔制度各有侧重,而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在不同选拔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发生,仅仅围绕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来探索高等教育女性化的成因存在局限。本文认为,理解高等教育女性化这一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全新现象,回归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必不可少。高等教育女性化蕴含着怎样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成为教育公平研究领域亟需厘清的前沿问题,也是需要教育学学者们重新审视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国际比较为开端,呈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发生在世界范围的普遍规律,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前提,进而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丰富并拓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边界、揭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女性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 二、重新审视大众化

### (一)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与必要条件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最早出现在欧美部分国家,随后向全球范围蔓延并成为普遍现象。截至目前,全球高校女生总量已经超过男生,女生仍处劣势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规模逐渐扩张的最近半个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状态不尽相同。在时间顺序方面,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较早、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较晚、部分国家和地区尚未发生;在女生数量优势方面,部分国家和地区女生数量优势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女生数量优势较小、部分国家和地区女生数量优势较为稳定、部分国家和地区女生数量优势持续扩大。虽然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存在上述不同形态,但无论形态如何都包含同一条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基本前提。通过整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当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

① M. Kimmel, *What About the Boys? Reconstructing Gender: A Multicultural Ant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pp.361—373.

②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08页。

③ S. Pinker, *The Sexual Paradox: Extreme Men, Gifted Women and the Real Gender Gap*, Toronto: Random House Canada, 2010, pp.69—70.

④ 邵志芳、庞维国、段芮:《高考试卷的性别分辨力及其与录取性别比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⑤ [日] 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学》,刘文君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

以对这一规律进行呈现,如表1所示。

表1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规律

发生年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国家/地区	发生年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国家/地区	发生年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国家/地区
1971	45.3%	前苏联	1983	32%	瑞典	1995	34.9%	爱尔兰
1971	14.3%	保加利亚	1983	12.1%	葡萄牙	1998	52.5%	奥地利
1971	17.6%	菲律宾	1984	29.2%	挪威	1999	25.5	捷克
1973	13.3%	波兰	1985	22.8%	希腊	2000	19.2%	突尼斯
1974	15.7%	芬兰	1986	28.5%	西班牙	2002	31.6%	秘鲁
1977	12.2%	匈牙利	1987	29.5%	澳大利亚	2003	19.9%	伊朗
1978	21.2%	阿根廷	1989	42.8%	新西兰	2004	22.6%	墨西哥
1979	52.5%	美国	1989	13.3%	哥伦比亚	2007	54.3%	智利
1979	16.6%	乌拉圭	1990	90.1%	加拿大	2009	24.2%	中国内地
1981	20.4%	冰岛	1991	35.2%	以色列	2011	60.5%	中国香港
1981	28.3%	丹麦	1992	33.8%	意大利	2012	56%	中国澳门
1982	16.1%	古巴	1993	38%	英国	2013	56.3%	瑞士
1983	27.4%	法国	1995	26.2%	克罗地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7年统计数据

注:因缺少在校生数据,本文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女减男”大于0来代表女性化的发生,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适龄人口性别比例略有不同,但不会影响对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和趋势的判断。中国台湾数据缺失,但通过多方了解可以初步明确,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已在中国台湾发生多年,即中国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在两岸四地均已发生。

在深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并参考欧洲经验的基础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丁·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规律性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将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看作精英高等教育(Elite Higher Education)与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的分界线,认为一个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旦超过50%,则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种“三阶段”的划分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通过梳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在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发生的当年,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表1所呈现的数据中,38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当年,仅有极少数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没有达到15%但已处在“15%左右”的范围内,并且这些情况集中发生在高等教育规模依然有限的20世纪70、80年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异,“大众化”也只是将要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基本前提。部分国家和地区如瑞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在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当年,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即处在普及化阶段;而日本、韩国等少数已经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仍未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以上情况说明,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需要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前提,而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国家和地区存在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不同形态甚至尚未发生的情况。据此可以判断,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与必要条件。<sup>①</sup>

## (二) 大众化内涵再考察

能够成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与必要条件,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蕴含着某些可以引起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在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进行全新的审视与考察,进而洞悉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sup>①</sup>必要条件也称必要非充分条件,是一种重要关系形式,引自数学与逻辑学。

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相关界定源自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三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并不断增长的意义上进行考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本质上是反映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然而不能仅从规模扩张来分析和评价高等教育大众化,因为这一过程包含着深刻的结构与性质的变化。在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转变过程中,精英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前,性质基本不会改变;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性质开始改变并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型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性质的前提下发展至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超过50%即高等教育开始迈向普及化,必然再创新的模式。<sup>①</sup>这一理论告诉人们,每当高等教育规模到达一个新阶段,高等教育的系统性质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开启了新的性别结构模式,这不仅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结果,更是与高等教育结构及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中,把规模增长概括为三种形式,包括增长率、教育系统与单个教育机构绝对规模、以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若干描述,其中一些方面与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密切相关,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创造条件,如表2所示。

表2 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描述

高等教育系统	大众化的相关描述	大众化理论边界的拓展
1. 系统规模	适龄人口15%~50%	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2. 观念和态度	已接受某种正规教育者的权利	
3. 高等教育的功能	培养更多技术与经济人才	
4. 机构多样性、特征与界限	综合,标准多样化,知识人群聚集地,界限模糊	
5. 入学与选拔	基于成绩,同时注重针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补偿	

资料来源: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  
注:关于高等教育由精英转向大众过程中的相关变化,马丁·特罗的描述不仅限于表中内容,表中仅列出与本文所探讨问题密切相关的5个方面,进而呈现高等教育女性化与大众化的逻辑关联,拓展大众化的理论边界。

第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是高等教育系统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增量公平,是社会进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生动写照。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在基础教育逐渐普及的前提下,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高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扩大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方式来满足高涨的社会需求,这为更加多元的群体提供了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20世纪后30年,性别平等与赋权成为世界范围有关社会包容与平等的核心议题,教育逐渐向全民化与普及化的方向发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利的详细指标,并鼓励世界各国重视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0年提出“全民教育”的理念并发表《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同样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教育公平的核心议题中。以此为契机,关于女性教育与发展的的问题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伴随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张,女性广泛参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常态。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体现了一种规模扩张中的增量公平,即首先强调高等教育资源的扩张和高等教育机会总量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追求机会的均等化问题,进而保证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少数族裔等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世界范围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以及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正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这一变化较为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主张,即高等教育女性化并未有损男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而是在两性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了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在总量上的超越。

<sup>①</sup>M. Trow,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Future Structur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aris, 26<sup>th</sup> — 29<sup>th</sup> June, 1973.



第二方面,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长与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密切相关,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待高等教育的观念和态度发生重要变化。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入学机会作为稀缺资源极为有限,接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出身好、天赋高、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统治阶层的精英;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15%左右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人们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是具有一定资格者的权利,其目的是培养职业化的技术人才;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进入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被看作一种社会义务,其目的是为所有人适应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做准备。在这种意义上,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性质由“特权”转变为“权利”,候选人的属性从“出身好、天赋高”转变为“具有一定资格”,培养目标由“统治阶层精英”转变为“职业化的技术人才”,呈现出受教育权利民主化的过程。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一书中谈及两性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关权力、统治、权威、卓越的定义常被冠以男性的内涵,从这种意义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考察,以上呈现的受教育权利民主化的一系列转变,生动地反映出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男性特权在大众化的进程中被逐渐稀释了。这是现代社会削弱男性统治关系的过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为女性大规模参与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更进一步,女性大规模参与高等教育也成为促使女性状况产生重要变化的关键因素。

第三方面,高等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包含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精英高等教育的功能体现在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能力,为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学术领域充当领袖做好准备;到了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转变为在更大的范围内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既包含原来精英高等教育对政府和学术部门领袖的培养,又扩大到为经济和技术组织培养人才;到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则进一步转变为培养所有人并提高人们应对迅速变化社会的能力。20世纪下半叶,随着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崛起,“知识/服务”促发新的社会分工,市场对“脑力”岗位相对“体力”岗位的需求不断上升,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普遍出现。这一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女性越来越多的进入社会且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逐渐增加,<sup>①</sup>女性逐步脱离农业、转入制造业尤其服务业的变化几乎出现在所有国家。在女性地位更平等的国家,更多依赖女性劳动力的产业往往获得更大发展。<sup>②</sup>大众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为技术与经济部门培养更多的职业人才,这为女性大量进入高等教育提供载体,同时也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些证据都意味着,在人类社会逐渐摆脱体力、更加依靠脑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知识经济驱动市场变革的过程中,女性参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基础,且就重要程度而言至少不再逊色于男性。

第四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特征。精英高等教育具有高度统一性和较为严格的标准,与外部社会存在清晰的界限;大众高等教育更加综合,标准也更加多元,与外部社会的界限变的模糊;普及高等教育则更加多样化,与外部社会的界限逐渐消失。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系统由单一走向综合,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在其中保持着精英传统,作为“混合型”高等教育体系,大众高等教育兼具了精英与大众的特征。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高等教育快速增长时代之初,高等教育的扩张对学术水准产生威胁、给政府预算增加负担。解决办法普遍倾向于建立更多成本低廉的院校,使之与传统的精英大学相结合,形成“混合型”的高等教育体系。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增长快速的公立院校和社区学院作为招生主力军,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女生人数在这一过程中增长迅速。<sup>③</sup>类似现象也在中国出现,少数精英大学以“世界一流”为目标,追求质量和学术水平上的“纵向”发展,规模变化有限;地方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进行规模上的“横向”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欧洲》,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62—63页。

②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第5—64页。

③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与体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发展,以满足国内社会需求。<sup>①</sup>许多院校通过增加人文社科专业进行规模扩张,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类专业投入少且就业前景好,如外语、金融、会计和商务管理。<sup>②</sup>以上做法在扩招初始阶段为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提供载体,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性别隔离开始瓦解,女生比例在所有专业中经历着增长。同时,女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数量也逐步增加,以北京大学为例,在这所大众化进程中依旧保持精英属性和领导地位的大学里,本科在校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5%增长到2000年的46%进一步增长到2005年的48%,其中工程类专业的女生比例也有较大提高。<sup>③</sup>

第五方面,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包含选拔标准的变化。精英高等教育有着较高的学术标准,最初以出身和地位为依据的入学标准逐渐被“英才成就”所代替,体现了精英高等教育较高的选拔标准;大众高等教育的学术评价标准趋向多样化,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作为入学条件的英才标准虽然被人们普遍认可,却被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所冲淡,人们通过补偿性政策和其他非学术标准来减少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到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逐渐对所有人开放,日益呈现出个体意愿和选择的性质,评价与选拔标准向“教育增值”转变,其目的是使所有人都能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提升、使不同群体的分布趋于合理,进而实现群体成就的平等以及群体间的包容。从世界范围来看,直接针对女性的补偿政策并未在高等教育入学选拔过程中普遍出现,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基础教育阶段,因为基础教育的获得对于女性能否参与高等教育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中小学失学女童比例较高的严峻事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全国妇联的指导下,通过开展“春蕾计划”资助数百万农村贫困女童重返校园,为她们日后接受高等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曾经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诉求和针对女性的补偿政策并未在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发生之后向男性身上明显转移。原因在于女性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体现的是增量公平的结果,基础教育阶段面向女性弱势群体的补偿政策并未伤害男性的教育机会,并且在精英高等教育转向大众高等教育最终转向普及高等教育的演进过程中,高等教育机会被赋予的权力色彩逐渐淡化、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成分越发突出,虽然发生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但是男性并未成为高等教育增量公平中的弱势群体,现在看来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识。

### 三、相对出让:大众化的新现象

#### (一) 临界范围与相对出让

前文呈现了高等教育女性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之间密切的逻辑关联,作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和必要条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和理论边界得到丰富和拓展。那么更进一步,应该如何理解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当年,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差异呢?本文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看作女性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优势(以下简称女性优势)的开始、男性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优势(以下简称男性优势)的结束,进而考察这一现象出现在高等教育机会的何种临界值上。通过考察高等教育女性化的临界范围这一关键数值,对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另一面即“男性优势的结束”进行反向推理,揭示其规律性问题。可以发现,女性优势正是伴随临界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出现的,临界范围的扩大过程也是两性相对优势发生翻转的过程,本文将这一过程以图1的形式呈现出来。

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高等教育女性化的起点与必要条件,为此提供重要参考。以15%的高等教育

<sup>①</sup>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sup>②</sup>Qiang Zha, “Diversification of Homogenization: How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Have Combined to (Re) Shap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Recent Massification Process”, *Higher Education*, Vol.58, No. 1, 2009, pp.41—58.

<sup>③</sup>许美德、李军、林静、查强:《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毛入学率为起始临界值,可以初步判断男性优势保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生之前,并在总体上结束于后进85%的适龄男性人口范围以内。<sup>①</sup>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存在差异,在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不同年份,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尽相同,这意味着男性优势结束的临界值各有差异,如表3所示。总的来看,世界范围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2年的后进78.4%的适龄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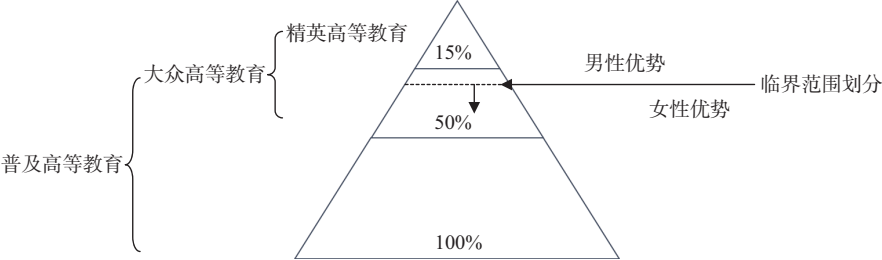


图1 高等教育女性化的临界范围

性人口。以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计,前苏联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71年的后进54.7%的适龄男性人口、阿根廷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78年的后进78.8%的适龄男性人口、美国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79年的后进47.5%的适龄男性人口、法国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83年的后进72.6%的适龄男性人口、新西兰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89年的后进57.2%的适龄男性人口、以色列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91年的后进64.8%的适龄男性人口、伊朗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3年的后进80.1%的适龄男性人口、中国内地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9年的后进75.8%的适龄男性人口。以国家群体计,高收入国家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90年的后进58.3%的适龄男性人口,中等收入国家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6年的后进79.4%的适龄男性人口;北美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79年的后进47.3%的适龄男性人口,欧盟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92年的后进67.5%的适龄男性人口,拉美与加勒比海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1993年的后进83.3%的适龄男性人口,中东与北非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6年的后进75.3%的适龄男性人口,东亚与太平洋男性优势的结束始于2009年的后进73.6%的适龄男性人口。

表3 高等教育女性化即男性优势结束的临界范围

国家/地区	美国	苏联	新西兰	以色列	法国	中国内地	阿根廷	伊朗
发生年份	1979	1971	1989	1991	1983	2009	1978	2003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2.5%	45.3%	42.8%	35.2%	27.4%	24.2%	21.2%	19.9%
临界范围	47.5%	54.7%	57.2%	64.8%	72.6%	75.8%	78.8%	80.1%
国家/地区	北美	欧盟	东亚与太平洋	中东与北非	拉美与加勒比海			
发生年份	1979	1992	2009	2006	1993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2.7%	32.5%	26.4%	24.7%	16.7%			
临界范围	47.3%	67.5%	73.6%	75.3%	83.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7年统计数据  
 注:表中“发生年份”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时间,与前文表1相同。表中“临界范围”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当年,未能参与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比例,呈现了女性优势开始即男性优势结束的临界值,即适龄男性人口在何种范围内开始“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

1998年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指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并避免使用统一尺度来衡量。这意味着,不能以传统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来衡量大众化阶段不同类型和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反之亦然。既然如此,不妨将一个

<sup>①</sup>文中“后进”仅指适龄男性人口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相对劣势,原因可能是学业相对落后、可能是对进入大学与否的自主选择、也可能更加复杂。



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看作一个整体进行估计。那么,以上数据呈现出高等教育总体较为优质的国家和地区,男性保持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优势的范围更大,即后进适龄男性人口范围更小的情况。这是又一个有价值的发现,男性优势结束的临界范围隐含着对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感知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男性对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出让”现象的存在,即男性相对于女性、<sup>①</sup>相对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自身优势而言,呈现出的一种让渡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与高等教育结构性质的转变密切相关。当高等教育褪去精英外衣逐渐进入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后,即便人们仍能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生活乐趣、安全感及高薪工作,但成为一种生活选择的事实已经无法避免,不断开放繁荣的“市场力量”渗透其中。随着世界经济模式的变革,资本积累资本的速度远比劳动积累资本的速度快得多,越来越昂贵的高等教育文凭不再是通向梦想的唯一途径,拥有更高学历的人也难轻易成功。同时,由于大量工人阶级青年开始进入大学,对中上层青年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sup>②</sup>“反学校文化”就是工人阶级子弟为学校教育带来的重要影响。以上这些变化可能导致被社会建构为“更加渴望成功”的青年男性放松对大众高等教育机会的占据。综上所述,本文将这种“相对出让”现象定义为: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其结构与性质发生转变,不断扩大的机会范围使女性优势逐渐显现的同时也使高等教育成本有所上涨、质量有所下降,<sup>③</sup>更大范围的男性通过追求学校外部繁荣市场中更多、更快、更好、更具经济价值的选择而有意识或由于竞争力下降而无意识地逐步让渡高等教育机会,<sup>④</sup>进而从侧面促进女性大范围参与高等教育并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一种社会过程与社会事实。<sup>⑤</sup>

无独有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过程也伴随类似情况的出现。通过考察《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不同省份高等教育男女生数据,发现最先“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男性人口来自90年代末的新疆、内蒙古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目前适龄男性人口“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较多的省份有河北、山东、广东、浙江、云南;直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即毛入学率超过50%,女性优势才在北京、上海出现;高等教育机会依然相对稀缺的湖北、安徽、江西3个中部省份以及高等教育总体较为优质的江苏,截至2014年仍未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即未达到适龄男性人口“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临界值。显而易见,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是相对较低的,河北、山东、广东、浙江、云南等省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也并不突出,北京、上海的高等教育质量明显领先全国其他地区。与世界范围类似的结论较为明显,高等教育总体较为优质或高等教育机会较为稀缺的省份,适龄男性人口“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范围较小,甚至仍有部分地区迟迟没有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

本文认为,虽然高等教育总体较为优质的国家和地区,男性保持优势的临界范围更大,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依旧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有关临界范围,即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临界范围不同,但总会出现一个女性优势取代男性优势的临界值,这反映了高等教育由精英迈向大众进而迈向普及的过程中,其规模、结构与性质的转变是较为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总体较为优质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还对应着领先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更好的性别平等状况,女性身在其中可以更加自由的追求高等教育,并在不断努力中证明自身的能力。因此,即便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男性人口范围较小,依然难以阻挡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

①在高等教育女性化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两性高等教育机会同时获得增长,因此是相对于女性而言。

②M. Trow,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③人们常以大众化阶段学生就业率下降为参照得出质量下降的假设,并伴有过度教育、教育错配等争论,伴随学生能力迁移与工作角色转变,这些争论逐渐淡化;另有观点认为扩张的高等教育背离精英本质导致质量下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大众化扩大了选拔天才的范围并促进了市场的活跃;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该树立多元化的质量观。

④以质量为参照,由低到高逐步出让。

⑤之所以是侧面促进,是因为社会进步与女生努力呈现出更多的正面因素。



## （二）“大众/精英”高等教育质量的结构属性

仅仅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看作一个整体显然是不够的,更进一步,本文以“知识”为核心考察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结构属性。在精英高等教育转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学作为以知识为核心进行运转的组织,其职能性质发生重要转变,由传授和研究高深知识转向服务社会需求。作为“混合型”系统,大众高等教育呈现了“大众/精英”式的混合结构,既包含传授和研究高深知识,又包含服务社会需求。在这里,有必要回顾高等教育三大职能及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辅相成,并呈现了适龄男性人口在“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感知。

19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受到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挑战,亨利·纽曼重新建构大学理念,使自由教育传统再次焕发生机,以知识作为大学唯一目的,通过自由教育为资产阶级培养绅士,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其中代表;同一时期,威廉·洪堡创立了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通过19世纪中后期的改革,逐渐强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乃至世界学术中心,标志着高等教育由英国模式进入德国模式,在科学主义大学观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成为大学主要目的与职能,并形成以学术领袖为核心的科层制体系。以上两种职能的接续呈现了精英高等教育由“古典”到“现代”的演进过程,在传统性别角色尚未被打破、性别不平等依旧严重的年代,无论是通过古典式的知识传授而培养绅士,还是强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都与当时的女性相距甚远。进入20世纪之后,在继承英国大学传统“通过教学而传递知识”、德国大学传统“通过科学研究而创造知识”的基础上,以运用知识增进社会福祉为主题的“威斯康星理念”引领大学职能的又一次开拓,“服务社会需求”的新职能在美国展开,美国就此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战后平权运动与教育民主化思潮促进世界各国开始重视性别平等与女性受教育权利,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女性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正是高等教育新职能“服务社会需求”的生动写照。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逐渐形成“大众/精英”式的混合结构,大众化结构中的精英大学依然保持着精英属性。

既然大学是围绕知识这一核心进行运转的,那么在以知识为核心的混合结构中,有关“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理应成为界定“大众/精英”的关键。通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战后民族国家的建立,由男性主导的科学技术被置于现代社会最显要的地位,指引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而使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知识。虽然在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身影开始活跃在包括传统男性领域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和精英大学,但科学中的性别隔离依旧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大学和劳动力市场、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这也再一次论证了“相对出让”现象的合理性,即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包含了“知识”结构和性质的变化,意味着不同价值的知识有了全新分布,保持精英属性的“创造型(或称控制型)知识”位于高等教育的价值中心、大众化的“应用型(或称服务型)知识”位于价值中心的外围。男性从外围的大众高等教育开始,“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并向中心缓慢渗透,进而从侧面促进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临界范围的差异,则恰当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大众/精英”高等教育独特的结构、价值与传统。在不约而同保持高等教育中心的“精英属性”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各自的方式向大众高等教育迈进,这些方式的相似之处在于扩展高等教育的外围边界,不同之处在于对各自独特的结构、价值与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各自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的回应。美国的公立院校和社区学院、英国的多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即日后的应用技术大学、中国的地方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等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别成为这些国家扩大学生规模的主力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因投入少且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多数国家大力扩张

<sup>①</sup>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与体系》,第21—101页。

应用型学科,成为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大规模增长的开端。例如,1998—2004年间,经济管理学、教育学、文学、法学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初期增幅最大的4类应用型人文社会学科。<sup>①</sup>与此同时,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况。部分欧洲国家通过扩张传统精英大学的方式向大众化迈进,这种以维持质量为目的的扩张方式却极大地降低了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最后不得不走上外围扩张的道路。德国则依据深厚的制造业传统扩张高等专科学校即日后的应用技术大学,形成交叉贯通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并在升学过程中发生明显的性别分流现象,男生大量涌入以制造业为依托的应用技术大学,延缓了其“相对出让”高等教育机会的时间和范围,导致其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晚于周边及其他发达国家2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2015年处于普及化阶段才开始出现。<sup>②</sup>

落脚国内,新疆和江苏是两个典型省份。新疆于1998年成为国内最早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省份,在质量之外还与其高等教育结构及传统密切相关。新疆存在偏重师范教育的传统,在18所本科院校中,师范院校达到5所之多且历史悠久,另有部分综合性大学由师范院校发展而成,其余均为医科、农林、艺术类院校;工程技术类学生多集中在专科院校,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始于百年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疆偏重师范教育的传统不仅与女性高等教育传统相契合,还呈现出一种重要政治安排即通过培养大量教师促进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这成为新疆首先发生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重要原因。<sup>③</sup>江苏作为国内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却出现高等教育女性化发生较晚的情况,呈现了与德国相似的经验,包括优质的高等教育、尚学的区域文化传统、国内领先的制造业水平、与先进制造业相适应的规模庞大且优质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sup>④</sup>

以上国内外经验均呈现高等教育质量具有结构属性、或者说高等教育结构具有质量属性的事实。人们通常认为,学科性别隔离应该是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最后壁垒,社会经济地位成为评判标准,男生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理工科领域、女生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略低的人文社科领域。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迈向大众化的不同选择,都或早或晚的促成了高等教育女性化的发生与发展,这使我们在学科性别隔离的基础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知识“中心/外围”的边界更加清晰了。伴随大众化与普及化的深入和女性自身的努力,在学科性别隔离逐渐瓦解的过程中,知识“中心/外围”的边界也将被触动。由此看来,围绕“知识的价值”这一核心因素对“大众/精英”高等教育中的“相对出让”现象进行考察,虽然未能避免以“男性经验”定义知识价值的局限,却仍可以拓展传统意义上高等教育性别分布及相关研究的界限,使我们对高等教育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理解更进一步。

#### 四、主要结论

本文以国际比较为开端,梳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规律,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在世界范围普遍出现的起点与必要条件。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进行深入考察,发现高等教育女性化与大众化之间不仅是时间与数字上的伴随,还蕴含着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结构与性质的重要转变。其中,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的增量公平使女性在更大范围能够受益;高等教育观念和态度伴随受教育权利民主化进程而转变,一定程度稀释了传统教育领域的男性特权;知识经济在转变高等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对女性人力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吸引女性通过追求高等教育进而参与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混合型”的大众高等教育结构通过设置多样的机构与专业,

①谢维和、文雯、李乐夫:《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结构分析:1998—2004年的实证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②马宇航:《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成因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29—134页。

③马宇航:《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成因研究》,第92—95页。

④马宇航:《中国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成因研究》,第96页。

为包括女性在内的更广泛群体大规模参与高等教育提供载体;以公平为导向的补偿性政策在世界范围普遍实施,容纳了更加广泛的群体参与高等教育。可见,大众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其规模、结构与性质的重要转变,均为女性大规模参与高等教育甚至在总量上超越男性创造条件,这揭示了高等教育女性化与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关联,呈现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sup>①</sup>

作为以知识为核心进行运转的组织,现代大学的职能日渐丰富,从“通过教学而传递知识”到“通过科学研究而创造知识”再到“运用知识增进社会福祉”的接续演进,塑造了不同价值的知识的全新分布。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两性数量优势翻转的临界值开始出现,历史性的“相对出让”现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逐渐发生。虽然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是大众化阶段女性不断努力的结果,但这一现象依然能从侧面反映出男性对高等教育性质与价值的感知,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大众/精英”高等教育的结构、价值与传统的差异,并且呈现出男性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之外拥有比女性更多的选择,正如贝蒂·弗里丹所言,男性的天地在世界上、男性的世界在不断扩展。<sup>②</sup>

综上所述,在重新挖掘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高等教育女性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关联、印证了高等教育女性化现象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丰富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公平的理论内涵、拓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公平的理论边界、呈现了女性参与之于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之于女性发展的重要价值。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 Rethinking Mass Higher Education: Origin and Internal Logic for 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 Yuhang

**Abstract:** The notion of 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depicts the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surpassing that of males in colleges appeared in China in 2009. The new gender gap has grown rapidly within 10 years, which has arous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both academia and society. 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ppeared in 1970s then spread worldwide rather than exists in China alon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this study found that mass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origin”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this study found the “critical range” where females’ advantage begins and males’ advantage ends, then put forward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at males “relatively transf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females in the stage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se discoveries may expand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in studying mass high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equity.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 femi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relatively transfer

**About the author:** MA Yuhang, PhD in Education,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①吴康宁:《何种教育理论?如何联系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问题再审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4页。